

文章编号: 2095-0365(2010) 04-0075-06

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

——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研究综述

周 珊¹, 赵 霞²

(1.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2.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 要:乡村社会秩序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秩序。同理,拯救乡村秩序的必要前提就是要重建乡村文化。由于以城市取向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良莠并存,相互激荡,使道德领域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乡村教育处于精神荒芜的境地,乡村文化越来越失去自信,而最终土崩瓦解。试图从乡村找到一种不受现代影响的,自足的、理想的文化只是一种乡愿,而坚持确保多元文化格局下的乡村文化的个性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新的文化自觉的思想才是当今乡村文化秩序危机的拯救与价值重建中最重要的。

关键词:现代性;乡村文化;秩序危机;道德秩序;乡村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5;F32 **文献标识码:**A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社会秩序看作是文化秩序,这是因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任何社会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乡村在中国的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始终占有主体地位,由于现代化的介入,中国乡村建设中的“秩序”与“乡村文化”建构问题重新被提出来。乡村秩序的形成不仅需要来自于政治治理的外在维护,还必须有乡村文化理念的内在秩序的生成。这是因为,乡村文化是农民尊严和价值的体现,反映着我国社会基层最基本的文化形态,自发地左右着农民的各种生存活动。为此,有必要梳理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的研究现状,总结经验,分析不足,为乡村文化价值的重构及乡村秩序的稳定提供理论支撑。

一、现代性进村与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

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说:“文化在我们探询如何去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从未想像过的方式重新出来了。”^[1]孙庆忠在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研究中发现,尽管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但是乡村文化自身的传统并未断裂。

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中,却依然在原有的关系网络中交换信息与资源,寻求支持与庇护,与城市人的联系极为有限。^[2]这就是文化惯性的力量。但是必须要承认,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乡村社会的文化内涵在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框架中被隐匿。学者们普遍认为,城市商品社会制造出来的流行文化、不切农村实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渗透到农村的诸多角落。以城市取向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原来的乡村文化秩序土崩瓦解。

温铁军认为,由于现代性因素向农村的全方位渗透,带有强烈消费主义特征的现代传媒进入农村,个人主义观念进村,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理念进村,这就使得相对封闭的村庄开始解体,传统文化和地方信仰被严重挤压而再难有生存空间。农村和农民在社会和文化上越来越被边缘化,农民的主体性逐步丧失。在快速的社会变动中,农民不再能从一直以来的传统中获得人生的稳定感,又不能从以广告和时尚所引领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中获得现代的人生意义,农民被抛入到

收稿日期: 2010-11-23

基金项目: 200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0903012)

作者简介: 周珊(198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一个传统已失,现代又不可得的尴尬境地,并由此导致农民的普遍无力感、无根感和焦虑感。^[3]赵旭东站在文化认同危机的基础上,认为在中国乡村文化后改革时代的全面复兴中,这种危机得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体现,即一方面是改革与再造,而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复兴,二者沿着各自的认同轨道运行,并行不悖。通过身份界定的政治学,乡村文化被界定为落后和迷信,村民被界定为现代意义上的“农民”,这些都与村民自己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相去甚远,潜在的认同危机由此而得以酝酿。^[4]石勇认为,由于文化认同危机,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农村普遍出现了一种无意识的精神上的不安、文化上的焦虑。^[5]

在对农民价值的研究中,贺雪峰把农民的生存价值分为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本体性价值需要回答农民的生活意义和价值,为什么或者怎样看待生与死的问题,这是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而社会性价值则回答的是农民如何看待他人及应该如何处理与他人关系的问题。^[6]陈柏峰、郭俊霞对受现代性影响的农民价值世界进行了深度思考,开始定位于农民的价值体系与生活世界,从村庄深处寻找社会转型与农民需求之间的关联。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使得现代性的因素不断渗入农民生活世界中,农民生活的逻辑和村庄治理的逻辑也因此发生了相应变化。“社会性价值最终被看做是毫无意义,而利益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此时,农民的价值世界彻底坍塌了。”^[7]或许是由于贺雪峰与陈柏峰的师生关系的缘故,他们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承继性和连续性。

农村的文化生态是一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立系统,是农村共同体内的一个精神家园,从本质上讲,它超越于感官的物质享受之上而不受农村的贫穷或富裕支配。农民需要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来表达自己的世俗关怀,表现自己人生意义。若不关心农民的文化生活,不关心他们人生意义的重建,他们在传统已失,现代价值却无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然会被各种其他力量所吸引,其中的一支强大力量是各式邪教。另一方面,当农民整体的人生价值不能确定时,整个社会的价值与道德空白是绝无可能依靠法律来填补的。因此,学者们基于现代化的视角研究农民的价值观与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就显得意义非凡。

目前学者们对乡村文化的研究是在把握了中

国一百年来的现代性经验的基础上,把当代中国的乡村文化研究放在这个历史纵深的坐标里,来认识当代中国乡村文化的历史延续和断裂,并从多个角度对现代性进村后造成的种种冲击以及由此形成的乡村文化的失序现象、乡村文化内涵的变种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在分析乡村文化失序的原因时,学者们的视角仍然相对集中在经济对文化的制约层面,对乡村文化的自身延续性、乡村文化的历史传承与代际传承等方面缺乏进一步的探讨,对于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文化价值的研究更是比较缺乏。这种忽视乡村文化自身的理论分析容易陷入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误区,既不利于对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深入研究,也不利于乡村文化秩序的重构。

二、道德话语的现代转换与乡村文化秩序的维护

改革开放30年来,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良莠并存,相互激荡,也使道德领域出现了种种矛盾和冲突。有学者把这种矛盾和冲突定义为“道德失范”,也有学者定义为“道德危机”。无论如何定位和定义,乡村社会出现伦理秩序的紊乱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露璐认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建设,乡村伦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将乡村伦理的传统理念与现代意识间的矛盾和冲突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农民力图致富的“经济理性”意识的增强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农民执着地将土地视为最基本生存条件的“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之间的冲突。二是,现代市场理念与传统平均主义意识的交织与混合的状态,并由此形成致富冲动与求同意识间的内在紧张与回应。三是,实际交易交往中“熟人失信”、“契约失灵”等现象的出现,导致农民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上的困惑与矛盾。四是,作为“隐形制度”的“礼”与作为“显形制度”的“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8]杜玉珍认为:社会转型期道德失序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道德范式、集体主义原则精神溃散,个人主义昌兴并向利己主义滑行;亲情、良心等内生性伦理秩序不再,乡村失序严重;传统美德遗失,落后道德滋生,乡村道德危机加重。^[9]曾长秋认为:乡村道德秩序构建中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以谋取物质利益来实现人生价值已成为当代农民的普遍追求和向往,价值取向偏差;二是基层权力道德欠缺;

三是农民缺少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 精神文化生活匮乏; 四是部分农民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理论认同与行为抉择之间产生矛盾。^[10] 此外, 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乡村社会中的某些具体的传统道德规范和伦理约束日渐削弱的现象, 例如生育伦理、环境伦理、婚姻家族伦理、风尚习俗的弱化等等, 并对其进行了论证, 呼吁重建乡村道德秩序。

在分析乡村伦理文化与道德文化转变的原因时, 学者们存在着一个普遍共识, 即乡村伦理的嬗变及冲突是伦理传统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这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伦理文化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在乡村场域中的体现。欧阳爱权认为: 当前乡村道德失范源自三方面: 一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乡村生产经营方式的不断变革, 乡村传统道德的承载基础受到连续冲击, 传统道德权威失落所造成的道德真空令乡村社会丧失了社会评价的标准与力量。二是强势的市场话语, 部分村民逐渐放弃了一向秉承的朴素道德要素, 自私观念与功利心态非理性膨胀, “金钱万能”观念凌驾一切之上。三是小农意识的残余文化心理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社会环境而死灰复燃, 抗拒着现代道德的自觉生成。^[11] 杜玉珍认为: 乡村改革的不周全以及道德伦理建设的自身缺陷, 共同促生、加剧了乡村社会道德伦理危机。^[9] 吴杰华认为: 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是在外力推动下的自上而下的治理与建构, 而传统的伦理道德则是内生于乡土社会的“地方性道德知识”。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 乡土社会的治理模式发生变迁, 显性的制度变迁必然会对传统的乡村伦理道德进行重塑, 而乡村伦理在看似被动回应的同时, 也会对制度变迁产生隐性的反作用力。^[12] 谢玉进认为: 一方面经济变革导致旧的道德规范被彻底推翻, 而新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还未建立, 农民在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中找不到合适的坐标; 另一方面,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农民被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阶层, 导致道德认知的多元化以及道德选择的相对主义。^[13]

那么如何在乡村伦理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种种紧张与冲突中找到两者的平衡? 如何实现中国乡村伦理的“历史之根”与“现代之源”的成功嫁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著名学者费孝通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伦理价值理念进行了堪称经典的分析概括, 指出传统力量和新的动力在中国农村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性。认为

中国乡村社会既不可能是传统的复归, 也不可能是西方工业文明以来乡村发展的复制品。费老的这一思想为当代学者的乡村道德文化建设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学者们将研究的关注域集中在社会转型期的现代化、城市化冲击下的乡村传统道德文化的重构和价值嬗变方面, 他们既重视乡村社会伦理传统的重要影响, 又顺应时代变迁实现其应有的现代转换, 力图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锋中找到既不排除经济市场化乃至全球化进程中的“现代性的伦理话语”, 也不脱离其长期孕育生存的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本土伦理文化资源。这是一条相对切实可行的在整合与优化乡村伦理文化资源中走向和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乡村伦理文化的实践路径。例如, 王建林认为: 农村社会的发展主题是通过村庄转型达到“从自然型静态和谐到自然与自觉相统一的动态和谐”的秩序性或状态性转变, 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只有文化层面的现代化, 特别是其核心要素——道德的现代化, 才是终极意义上的现代化, 也可以为村庄的顺利转型提供足够的动力资源、精神支撑。^[14] 学者王露璐认为: 如果一味固守生成于小农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伦理传统, 试图将走向现代化的乡村社会变成与现代市场意识和价值观念相隔离的“世外桃源”, 无视乡村伦理传统的影响, 希冀以全方位的“伦理现代化”使现代性的道德话语和道德规范在乡村社会获得强势甚或宰制的地位, 其后果必定失败。由此可见, 学者们将研究的关注域集中在社会转型期, 现代化、城市化冲击下的乡村传统道德文化的重构和价值嬗变方面, 他们既重视乡村社会伦理传统的重要影响, 又顺应时代变迁实现其应有的现代转换, 力图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锋中找到既不排除经济市场化乃至全球化进程中的“现代性的伦理话语”, 也不脱离其长期孕育生存的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本土伦理文化资源。这是一条相对切实可行的在整合与优化乡村伦理文化资源中走向和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乡村伦理文化的实践路径。

在研究乡村道德秩序建立的过程中, 学者们也提出了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建构措施。当然, 这些措施非常具体各有侧重, 在此不一一列举, 只试举其中的部分观点。例如, 罗文章认为: 当代中国的乡村道德建设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对农村道德建设的引领作用, 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基本价值取向, 由依

赖性道德转变为自主性道德,由封闭性道德转向开放性道德,由一元道德转向社会主义道德为主导的多元道德,确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培养文明理性的社会习俗。^[15]谢玉进认为应加强道德教育,建立专门的道德教育机构,并加大道德教育的物质保障力度。刘晔原则是从传媒与宣传的角度认为:要正视现代农村道德“沙化”的现状,“传统陷下去的,要靠现代(道德)来补足”,用现代化的网络和传媒加强农村的道德教育,让道德渗透人们的心灵,使得人们去追求善、追求美德,使农村的精神文化富足起来。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的“虚化”

乡村教育也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乡村问题以及乡村文化时的热点问题。关注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不仅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同样是关注我们自身生命品质的要求。尽管研究中国乡村教育的前提是,要有对中国乡村的价值观念、社会组织、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包括信仰和仪式)的历史与现状的真实的、确凿的认识和判断,还应该特别关注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国家建设”抑或“民族建构”中扮演的角色和被赋予的地位。但是,由于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了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侵蚀和破坏,使乡村教育处于精神荒芜的境地,学者们在探讨乡村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未来的发展之路时几乎统一地站在这一角度。

例如,刘铁芳教授认为,我们当前的乡村教育是一种城市中心导向的教育。当乡村教育体系以城市取向为标准时,乡村本土文化中原本潜藏着的丰富教育资源,乡村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民间智慧与经验、知识和美德,都为城市取向的教育体系以愚昧、落后、封建、浅薄等理由所拒绝,城市教育体系拒绝承认或无法认识到这些教育资源的价值。^[16]钱理群先生认为:农村教育走不出应试教育的铁的逻辑,应试教育就是城市中心的教育。我们的乡村教育,是与乡村生活无关的教育,是完全脱离中国农村实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我国基本国情的教育,是根本不考虑农村改造与建设需要的教育,也就是说,农村完全退出了我们的乡村教育以及整个教育的视野。他们既无从事沉重的农业劳动的体力与习惯,也没有从事多种经营,参与农村改造、建设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城市取向”的教育使他们的

心灵已经失去了农村的家园,即使身在农村,也无心在农村寻求发展。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成了在城市与农村都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游民”。^[17]李政涛认为:乡村教育亟需精神食粮的抚慰,而在城市文化的巨大吸引与充斥下,乡村教育不得不融入到其体系中,接受城市取向的教育设计。在教育领域,城市化总体表现为乡村教育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逐步融入现代城市体系,与此相应,乡村教育参与者的教育价值观和受其影响的教学观、课程观、教师观和学生观,以及在这些观念支配下产生的教育世界特有的教育生活方式等,都将向城市教育转化。^[18]赖长春认为:乡村社会由于自身功能上的欠缺而处于一种被城市排斥的状态,乡村教育正在面临新的危机,正在普遍范围内生产社会排斥。表现在:一、城市中心的课程价值取向未能培养起儿童对乡村的认同感;二、乡土课程的不得建立与乡村德育的无效,使乡村学生进一步丧失文化根基,成为“精神游民”;三、精英教育体系倚重于“向上看、往上流”的民众意识,直接塑造了精英们对乡村的离弃心理。^[19]

教育的功能是双向的,或者会产生冲突,也可以促进社会团结与和谐,关键看施以怎样的教育。那么,怎样从乡村教育发生的根本点着手,全面寻求在作为教育场域的乡村世界中,农民精神与人格健全发展的根本出路?钱理群先生认为:我们一定要走出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强调其互补性。也不可将乡村文化、教育“过于理想化”,要认识到其自身的不足与劣势,向城市文化、教育吸取资源,并以之为借鉴。^[20]学者罗建河就认为,让当前的乡村教育培养“适于乡村生活的人”似乎不太可能,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转变思路,让乡村教育致力于建设“吸引人”的乡村生活方式。刘铁芳教授说,乡村教育需要人文重建,要重新确认乡村文化在整个社会、民族文化中的价值和地位,重新确认乡村文化作为乡村教育和整个国家教育的文化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一是学校教育中乡村文化视野的敞开与乡村少年文化自信心的培育,在文化冲突之中引导乡村少年的健康人格的发育;二是加强乡村社会的文化建设,主要包括提高村民社会的文化福利意识。^[16]赖长春认为:切实加强乡情教育,培养当下的乡村儿童(未来的乡村公民)对乡村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建立起基本的乡村文化自信,塑造建设乡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使命感,以重振社区精神。^[19]石

中英说:当代中国乡村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引导农民和他们的后代,正确理解他们所生产、所传承、所享受、所创造的文明,并作为基本的精神资源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下去。乡村教育不能只教会学生“如何生存”,而更应该关注学生的文明观与世界观的培育,使他们懂得追求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21]

四、乡村文化秩序研究的延展性思考

文化研究作为研究当代课题的重要视角,是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世俗关怀和批判意识的学科,无论在思想和知识领域还是在社会实践领域都具有突出的前瞻性和创新特征。这对于中国这个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的国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都同样明显。“文化研究”不是一套固定的理论和治学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干预社会,使社会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一种学术探索。“文化研究”培养的不仅是一种批判精神,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批判精神,这种反思能力也使我们在面对乡村的人和事时,保持一种同情的理解与尊重的态度。从这种精神而言,文化研究不是无法用于乡村,而是特别适合乡村。

由于受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在乡村文化的研究中,出现了悲观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激进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例如,来自政治学和法学领域的文化学者,认为乡村的生活是愚昧落后的,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抑制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使其变得封闭和缺乏活力。因此,国家应当为乡村注入现代化的因素,实现乡村的城市化。在这种“传统——现代”二分法和单线式进化分析中,透着一股社会达尔文式的冲动和紧张。一方面,他们对当代乡村文化秩序重构过程中所出现的现代性的迟滞表示忧心忡忡;另一方面,由于认为传统秩序的观念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落后性,因而他们对传统秩序的复兴诚惶诚恐。而以民俗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的学者们则往往带有强烈的乡土情绪和田园向往,他们将乡村理解为“爱的天堂”,乡村社会秩序因充满人情味而显得宁静和谐,乡村因此应当成为未来人的精神家园。在对待乡村文化的态度上,无论是持一种过于否定的态度,还是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情结,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削减人们对乡村文化的功能认同。

因此,在进行乡村文化的研究时,必须要考虑我们对待乡村文化的科学的辩证的态度究竟是什

么。对待乡村文化,走新的文化自觉的道路是目前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既不过分夸大乡村文化传统的美好,也不使乡村文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被完全同化,确保多元文化格局下的乡村文化的个性化和现代化发展是最为重要的。

文化自觉的思想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率先提出。他认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内。”也就是说,“中西文化碰了头,中西文化的比较,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他们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争论不休,可以说至今还在继续中。”^[22]

试图从乡村找到一种不受现代影响的,自足的、理想的文化只是一种乡愿。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乡村不再是传统的乡村,但乡村的未来也不是今天的城市。无论我们的社会处于工业化甚或后工业化阶段,乡村文化的价值是始终存在的。那种认为农业文明必将为工业文明所取代、乡村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被淘汰的简单线性思维是错误和有害的,必须抛弃。那种认为乡村文化就是城市文化的未来精神归属的主张也是一种善良的怀想,也应当抛弃。与之对应的是,我们必须承认未来乡村文化发展的多元性,树立起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与乡村文化和谐共生的思维,必须在推进城市化的实践中为乡村文化留出足够的空间。

这就要做到:第一,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的传统。一种文化能否从容应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取决于它的根基、结构、内涵和自信。根基牢固、结构稳定、内涵深厚、传统悠久、自信度高、进取心强,便可能因势利导,兼收并蓄,发展创造,乘势而上,不断迈向新的阶段,反之,则很容易受冲击破坏,变质衰落,甚至土崩瓦解。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农村,礼失而求诸野,乡土中国仍然保持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汁,从乡土中寻找中国现代性的智慧,是一条可能的路径。第二,建立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反哺机制。实行城市居民无障碍地流向乡村,进而接受乡村文化熏陶和教化的乡村文化保护策略和路径。具体言之,在乡村文化的存

在空间既定的情况下,通过扫除城市居民向乡村流动的障碍,促使更多的城市居民在乡村定居生活。一旦有更多的国民进入乡村,更长时间地与乡村文化拥抱接触,接受乡村文化的熏陶教化,其结果就是乡村文化得到更多社会成员的重视和自觉保护,乡村文化的基因被输入到更多的国民身

上。第三,先进文化对乡村文化社会化的引领。以尊重多元文化为原则,尊重乡村文化的独特性,注重当地文化与其他种类文化的整合。以先进文化引领乡村文化建设,使先进文化被人们所接受、掌握,进而内化成为自我思想意识与行为的内在导向,从而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乡村文化。

参考文献:

- [1] 马歇尔·萨林斯. 甜蜜的悲哀[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 [2] 孙庆忠. 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J]. 江海学刊, 2009(4).
- [3] 温铁军. 乡村建设重在文化建设[J]. 小城镇建设, 2005(10): 15.
- [4] 赵旭东. “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身份界定的政治学——乡村文化复兴的二律背反”//[A]. 李小云、赵旭东. 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M]. 2008: 320-336.
- [5] 石勇. 被文化殖民的农村[J]. 天涯, 2005(1): 37-39.
- [6] 贺雪峰. 中国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辽宁大古村调查为例[J]. 学习与探索, 2007(5): 12-14.
- [7] 陈柏峰, 郭俊霞. 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 皖北李圩村调查[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 [8] 王露璐. 嬗变·冲突·和谐——中国农村改革30年来的伦理变迁与反思[N]. 光明日报, 2009-4-11(6).
- [9] 杜玉珍. 重建乡村和谐之基——伦理道德[J]. 前沿, 2009(7): 26-29.
- [10] 曾长秋. 和谐新农村视角下道德秩序的构建[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8(6): 17-20.
- [11] 欧阳爱权. 试论乡村道德失范与重建考量[J]. 党政干部学刊, 2009(6): 59-60.
- [12] 吴杰华. 社会转型期的乡村社会公共伦理建设剖析[J]. 前沿, 2009(6): 30-33.
- [13] 谢玉进. “新农村”的道德诉求: 农村道德教育专门化之探讨[J]. 理论观察, 2006(3): 67-68.
- [14] 王建林. 道德秩序中的和谐农村——试论村庄转型中道德的时代价值[J]. 黑河学刊, 2006(3): 18-20.
- [15] 罗文章. 新农村道德建设研究[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
- [16] 刘铁芳. 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J]. 读书, 2001, (12): 19-24.
- [17] 钱理群. 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 [18] 李政涛.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发展模式研究[J]. 江西教育科研, 2001(9): 7-9.
- [19] 赖长春.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乡村教育[J]. 经济管理文摘, 2008(13): 37-40.
- [20] 钱理群. 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讲演录[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21] 石中英. 失重的农村文明与农村教育//[A]. 钱理群, 刘铁芳. 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 [22] 费孝通. 费孝通九十新语[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 207-208.

Order Crisis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Country Culture

——Review of Research on Country Culture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ZHOU Shan¹, ZHAO Xia²

(1.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2.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Any social order is the culture order. The country social order is the country culture order. Similarly, saving the country social order is to rebuild the country culture first. Due to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 which treats urban orientation as the center, and mutual reaction of various thoughts and values,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ppear in moral domain. The country education is in a spirit-desert. The country culture has lost its confidence and would finally crumble. Trying to find a kind of self-sufficient and ideal culture without modern influence is an impracticable noti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solving today's order crisis and the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culture are to ensure the individualized country culture in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to ensure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new cultur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modernity; the country culture; order crisis; moral order; the country education